

慷慨捐藏品 赓续两代情

□ 张树田

在唐山劳动日报社为筹建报社馆征集的史料中，有一幅该报首任社长、总编辑、著名作家陈大远先生于38年前手书的七绝诗作条幅。时年七旬老人的墨迹依然苍劲如初，寄托着一位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对家乡报业发展和后辈报人的殷切期望，拳拳之心，力透纸背。细心的编采人员品味后发现，条幅上明白无误地写有“益华贤侄清赏”字样。益华是何人？其中隐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笔者几经探究，终于基本厘清了个中的起始缘由。

1916年出生于丰润的陈大远先生，早在抗战烽火连天的1941年，即投身冀东地区的革命斗争，先后参与《救国报》《冀东日报》等我党报纸的创建和领导工作。在险恶的战争环境和艰苦的岁月里，他和战友们戮力同心，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辗转奋战在北部山区的丛林村落，使报纸成为在茫茫黑夜中引领冀东军民的指路明灯和战斗号角。在血与火的日子，陈大远发现晚他4年进入报社的韩继湘这个小伙子为人憨厚，任劳任怨，每天四处奔波，为报社寻觅筹集那个年代极难到手的笔墨、纸张等印刷物资。两人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唐山解放后，陈大远担任唐山劳动日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韩继湘也成了报社财务工作的负责人。两人继续发扬战争年代密切合作的革命传统，进一步加深了战友间的深厚情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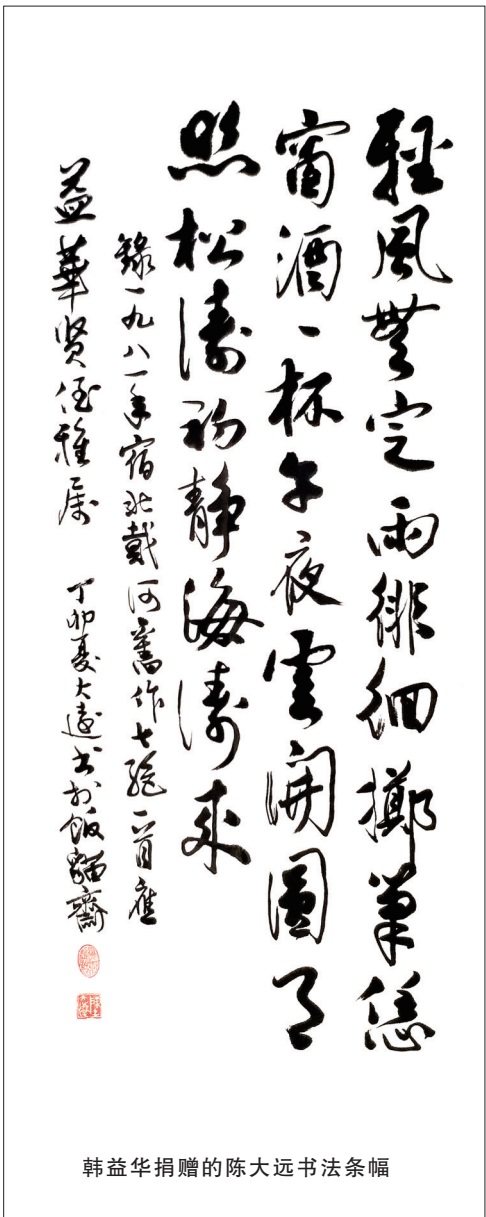
韩继湘之子韩益华至今记得进城初期报社的状态，编辑记者们都穿着普普通通甚至破破烂烂，根本不像文化人。在十座楼（报社当时所在地）院子里，这些“土包子”出出进进，每天好像总有干不完的事。韩益华讲述当年他们儿时许多趣事后告诉笔者：“我们对陈大爷这样的文化人虽然十分敬重，但也常开些没大没小的玩笑，从

中也知晓了许多长辈们与敌周旋办报的故事。逢年过节，父亲都会带着我们到各家串门，而我去陈大爷家的次数最多。”韩益华说：“陈大爷后来到驻丹麦大使馆、北京涉外部门工作，我一如既往地经常拜访他。因为有他引荐，我还有机会得以见到著名作家管桦等许多知名人物和大领导呢。”我猜想，可能就是因为这爷俩频繁的深度交往，才有了1986年那次贤侄斗胆求字、陈大爷欣然命笔以文会友的机会。

1994年，韩益华喜获墨宝的8年后，突然惊闻陈大远先生在京溘然辞世的噩耗，他不禁仰面痛哭。也曾任报社工作的他，想到自己父子两代人承蒙陈先生的多年厚爱，睹物思人，不禁手抚墨香犹存的条幅，下决心一定要将先辈的遗物好好留存，作为传家之宝。

然而，韩益华精心收藏的这幅从未示人的珍品的命运却在多年后发生了变化。报社为赓续红色血脉决定筹建报社馆，广泛收集相关史料和实物，力求以详实的材料展现由《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几十年一路走来的峥嵘历程。贾宝芳、陈雷两位记者在寻访中从老报人杨桂林口中获得相关线索后，马不停蹄逐个家访，于是就有了两人忐忑不安地叩响并不相识的年已八旬的韩益华老人家门的一幕。

令两位“不速之客”既惊喜又释然的是，韩益华得知来意，二话没说，马上翻箱倒柜，找出陈大远、肖一等一众已故老报人的遗作，任二人挑选。报社书画院负责人贾宝芳深知这些名人之作的珍贵，实是不忍无偿夺人至爱，几经犹豫，最后试探性地提出只把陈大远先生的手迹作为镇馆之宝留存的请求。万未料到，韩益华老人立即慨然应允，双手奉上。两位记者亦非常理解韩益华老人对凝聚着两代人深情书作的



韩益华捐赠的陈大远书法条幅

不舍，对其忍痛割爱的义举连连称谢。而老人坚定地表示，与其个人收藏，不如荫及后人，此举善莫大焉。

作为当年曾亲眼见过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唐山劳动日报》报头真迹现唯一健在的老报人，韩益华对这张报纸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以陈大远先生的翰墨为载体，几代人共同延续传承着党报的红色基因。

民间故事一瞥

七十二场浇陵雨

□ 王克俭

在位于唐山遵化马兰峪的清东陵一带，有“七十二场浇陵雨”之说，而且越传越神。据先前守陵人说，“这七十二场浇陵雨是专门为清东陵下的，为的是洗刷陵园，让祖宗的恩泽永不蒙尘，护佑大清江山常在”。其实，这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的巧合，大可不必牵强附会。无论是民间传说，还是科学论证，抑或是历史事实，都不支持“护佑说”。

相传清东陵竣工后，清王朝开国皇帝顺治前来观瞻。他眼前一亮，疑似得见天堂之景：那牌楼飞檐斗拱，直接云天；那神道汉白玉铺就，白得耀目；那石雕石像栩栩如生，神态可辨；那殿宇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顺治大喜过望，感慨系之“寿宫在此，可保大清国运昌盛啊！”

突然，斜刺里刮来一阵冷风，风里夹杂着细沙，蒙住了顺治的双眼。他眉头一皱，忧从中来：天有不测风云，一旦秋冬蒙古那边的风沙刮过来，岂不令朕的寿宫蒙尘，更关乎大清国的国运，兹事体大，当如何是好呢？回到北京，顺治那颗悬着的心也没放下来。

怕啥来啥。冬天的西北风乘着蒙古的寒流南下，咆哮着冲破燕山阻隔，直扑遵化马兰峪昌瑞山下的清东陵。刹那间，烟尘滚滚，遮天蔽日，清东陵笼罩在尘埃之中，所有的建筑都蒙上了沙尘。此情此景，传到京城，直觉得顺治皇帝坐立不安。

然而不久，阵阵春雷又给顺治皇

帝带来了好消息。马兰峪迎来了第一场春雨。雨过天晴，彩虹当空，清东陵的宫殿、牌楼、神路、雕刻等陵区建筑，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圣洁如初，顺治闻听喜不自禁，心上的石头落了地，感恩苍天垂爱。

从这场春雨过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雨水光临，每一场雨都把陵区的建筑物刷洗得清新净美，即使风沙来袭，还有雨水等着它。不知哪个有心的护陵人做过统计，从初春第一场雨到秋末雨歇，共下了七十二场，护陵人称之为七十二场浇陵雨。这当然是为了讨皇帝的欢心，一代一代的帝王们，还指望寿宫风水为大清朝续命呢。

其实，东陵多雨并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东陵一带的气候条件决定的。俗话说“沿海多风，山区多雨”，马兰峪地处山区，土地肥沃，植被茂盛，特别是北部原始森林方圆百里，万木葱茏，这些都能有效地涵养水源，在日照之下，水不断蒸发，遇冷空气，便形成雨，这才是东陵多雨的原因。“七十二场浇陵雨”只是对清东陵的清洗起到了一定作用，却没能挡住大清朝覆亡的脚步。

真正受益于七十二场浇陵雨的，是清东陵所在地马兰峪，是那里的普通百姓。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当家做了主人，在自家风水宝地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雨润万物，人寿年丰。如今的马兰峪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成为清东陵旅游的一大亮点。正是：“挽将天下银河水，散作甘霖润九州。”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21）

□ 王烁辉

（接上期）

2.《冀东日报》映射冀东党报的成熟

抗战前，冀东地区的建制包括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蓟县、兴隆、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卢龙、抚宁、临榆、昌黎、滦县、乐亭共22县和唐山市及秦皇岛、塘沽两港；抗日战争时期，以冀东为基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向热河、辽宁省推进，向北沿七老图山发展到赤峰，向东沿江西走廊发展到锦西、朝阳地区，曾相继建为冀热边、冀热辽区（至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调整地区建制之时，共辖9个专署、70余县、1900多万人口）；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复称冀东。

1946年5月15日，《长城日报》更名为《冀东日报》。这一天的《冀东日报》在一版报角登有一则更名启事：

“本报自298期更名为《冀东日报》，《长城日报》之名即行取消。”

这则启事，在1946年5月15日、16日、18日和20日的《冀东日报》上，连续刊登了4期。

新创刊的《冀东日报》仍延续了从《救国报》到《冀热辽日报》再到《长城日报》的期号，首刊期号为第298期。

冀东日报社社长由中共冀东区委宣传部部长张达兼任，吴明任副社长，孔祥均任编辑部部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从晋察冀边区调来的白英任《冀东日报》地方版主任。

办报骨干人员的充实是《冀东日报》快速发展与成熟的基本支柱：陈大远、高元、山桥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分别承担了重要工作；《救国报》更名后各地方版相继撤销，一部分人员留作地区新华社支社工作人员，另一部分人则陆续调回总社。报社的编采部门早在1945年8月新华分社成立时，便与之合署办公，不论地域规划与报纸名称如何变更，始终为一套人马、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到《冀东日报》时期，编采部门的工作人员已达到60人左右，其中还有了报社（或新华社）的专门记者。

冀东日报社成立后，更加健全了编辑委员会（当时它也起到党组作用），成立了编辑

部、采通部，各版专设主编，采通部负责采访、通讯，并负责培养通讯员工作；建立通讯网，这项工作与各地新华社支社、县通讯站配合进行，保证了按日不误地收录延安新华社社文字广播稿，按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每日同晋察冀新华社总分社和本区内各新华社支社联络一次。

《救国报》《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创办期间，都是免费赠阅，有时报纸上虽标有定价，但实际不收费。1946年初，报社抽调张助国、李树琴等4位同志组建了发行科，张助国任科长。发行科先期开始征求订户，以县为单位，由县代销机关征求全县订户。报纸名称改为《冀东日报》后开始正式收费，初始每份报纸定价为边币5元（当时市场价每斤小米为边币100元）。冀东区委非常重视党的宣传工作与宣传战线同志们的生活，在报纸更名《冀东日报》前，已将报社工作人员报酬由供给制改为实行小米津贴，每人每月约五六十斤小米。

1946年1月到9月，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冀东解放区前的一段空隙时间里，冀东日报社紧锣密鼓地做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作，如：有了环境相对安定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场地；组建了设备较完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铅印印刷厂；建立了必要渠道，使工作和生活物资可以得到基本满足；有了一个相当有力的电台组织，完全可以承担起对上对下收发新闻和文稿的任务。

这时办报的基本条件，可以说比办《救国报》时好多了。尤其是改成铅印报纸后，《冀东日报》的字数增多，版面清晰，印刷也快，非常受读者欢迎，印数不断增加，印刷部门也逐步扩大规模。

1946年5月，报社的印刷和编辑部门一分为二，单独成立了“冀东印刷厂”，隶属于区委宣传部，由冀东日报社领导，鲁直（此时起改名为李农）任厂长兼指导员。

开始时，厂里只有从丰润接收的八页印刷机是完整的，能直接印报。而从锦州、张家口接收来的八页机因在运输途中丢失了部分零配件，不能运转。此时，厂里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从唐山接来一位名叫张本初的印刷技术能手，他带着郑有义等几位同志，找到一家干小修配活儿的作坊，与作

坊主人刘大爷一起，硬是用脚踏床床手工打磨的方式，制出所需部件，先后组装成第二台、第三台八页印刷机，能完全保障正常出版的需求。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当年秋开始增加兵力从通县、唐山、喜峰口关外三个方向进攻冀东解放区。冀东日报社迅速撤出遵化县城，与敌周旋于遵化、迁西和兴隆无人区一带，那里的荒山密林、寺庙古刹、农舍羊圈，都曾是冀东新闻人办报的地点。

印刷厂因设备过于醒目容易暴露，更是频繁转移。9月上旬，一股敌人向遵化西部进犯，根据多年游击活动的经验，同志们急行军几十公里，从城西的郭庄子村转移到遵化县城东南部的夜明峪村，第一时间用相对易于携带的圆盘机和少量铅字，先在这里印了三期十六开的《冀东日报》小报版。半个月后，又一股敌人进犯。同志们连夜向南转移，过还乡河先后在丰润县的皮古秀、上水路、下水路村住了4天。待形势略有稳定，便又组织车辆拉上坚壁的设备转移到迁西的才庄村。

一次次转移中还要突击排印，由于时间紧迫、敌情紧张，同志们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两三天连轴转。有的同志两天一夜未休息，拣字时站着就睡着了，打上三五分钟的盹就清醒过来，强打精神继续拣字。在战争环境下的农村，没有电和电动机，八页印刷机都是靠人力摇动大轮。每印一张报纸，大动轮须连续转四周。一台八页印刷机要配备3个小伙子轮换着摇轮。一般每小时印一千多张，也就是说要摇四千多下，而当时《冀东日报》的发行量是1万多份。所以哪怕是在秋冬季节，小伙子们也是累得汗流浹背。每在一地完成印报任务后，同志们又要再次突击拆卸字架子和设备，装箱、捆绑、装车，跟着大队转移。就这样一路辗转，终于在年底前于迁西县松岭村暂时安顿下来。说是安顿，也不过半年多时间，1947年8月又迁回遵化城东铁山岭；10月进驻遵化县东北上港村；12月进驻遵化城西塔寺村……据同志们事后回忆，印刷厂自成立到唐山解放后进入市区，共辗转于6个县、近20个村庄。

印刷厂此时还负责着冀东地区党、行署和军队各部门大量文件、书刊的印刷出版任务，所需物资也日益增长。

常用的铅字和字空、铅条等材料都非常金贵，废铅字和掉在地上的铅碴都要捡起来回炉再用。印刷厂在初建时接收了一台手摇铸字机，但开始时没有人会使用，冯润田和任品三、王守成、卢恩贵等同志边研究摸索边试着铸字，到1947年铸出了两倍于之前的新铅字。

需求最迫切的是纸张。当时不可能去敌占城市大量采购，只能依靠农村的小作坊供应，所幸报社驻地迁安有这种传统手工业。于是在上级领导大力支持下，报社和印刷厂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协议筹备，由迁安的“显记”造纸厂长期负责供应毛糙纸、红心纸印报。因条件所限，此时的《冀东日报》多为单面印刷。

其他如油墨、铅、锡等印刷物资则只能冒险潜入敌占城市采购。在冀东区委、行政公署和民运部等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张声远、郭荫增、邱贵义、王志田、张德奇、王志清等同志，依靠在北平、天津、唐山的我党地下组织，一次次克服各种艰难困苦，冒着生命危险，执行秘密采购任务。其间曾有一位同志进敌占区采购物资时被驻唐山的国民党军队逮捕，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后被党组织营救出来，但已落了一身伤病。

条件的艰难并没有挡住报纸走向成熟与完善的步伐。1947年4月4日，《冀东日报》开始创办副刊。副刊第一期发表了“开始的话”，大意是，“日报特辟副刊，作为大家的园地，其目的是为大家服务，其性质是综合的，其方针是：大家看、大家办。”新增添的内容有：《生产副刊》《文艺副刊》《教育副刊》《卫生副刊》《经济副刊》等，每星期或每半月轮流在第四版刊登。副刊文字浅显易懂，内容密切联系实际，还刊出一些评论以及编者谈、三言两语等文稿，使《冀东日报》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增加副刊后，报纸售价提至每份边币50元，后因物价波动等原因，到7月1日又调至每份边币200元（此时每斤小米边币550元）。

《冀东日报》是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

纸。它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很受冀东百姓的欢迎。1947年7月，《冀东日报》在报上公开征求读者意见，并根据读者建议加以改进，如大反攻开始后，读者希望报纸能配合军事形势的变化多登些地图等资料，为此报纸在发消息时，都由编辑画出示意图，再由制版工人一刀一刀地在木板上刻出来。春耕来临，《冀东日报》就开辟专栏介绍科学种田和制造肥料的方法。农民养猪，报纸又经常介绍一些常见的猪病预防和治疗方法。清明前后，农民有种树习惯，报纸就介绍种树的好处和各种树木的种植与管理方法。战争环境下，人民生活 and 居住环境都不安定，流动性大，又没有像样的邮局，群众写信很困难。报社就利用自己的优势，经常刊登为烈军属和普通群众寻找亲人的读者来信。

这些做法，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也意味着这张报纸在它自身发展中，已不仅仅是在革命斗争或建设中作为党的宣传武器，而且发展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

《冀东日报》在前一年半时间里，名为日报，实际是双日报，遇到特殊情况，双日报也不能保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能保证每月出15期报纸。每期四开四版。有时内容多，就临时改为六块版或八块版。

版面主要内容：一版是国内外要闻，二版是地方新闻，三版是通讯报道，四版机动安排，比如1947年记者节来临之际，《冀东日报》为悼念死难的新闻工作者，在第四版上简要介绍了吕光、李杉、顾宁、布于、张大雨、唐炎、范捷民、杜风、寒潮、杨玉环等烈士的事迹。

1947年11月至12月，报社改组，杨林（原冀东十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调任《冀东日报》社任副社长，孟广平（原十四地委组织部部长）调任《冀东日报》任编辑部部长，孔祥均任编辑部副部长，吴明调离。并从县委抽调一批干部充实报社的力量。

编辑部改组为编辑科、采通科、资料室。王重五从新华社十五支社调到采通科任副科长，采通科实际执行新华社冀东分社任务，对内为编辑科发稿，对外向延安总社和冀热辽总分社发稿。

（待续）